

投资体制改革探索

刘金元 著

10.5
中国改革研究丛书
薄一波题

重 庆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 邹光海
封面设计 王庆伦
技术设计 刘黎东

刘 溶 沧 著
投资体制改革探索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达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5插页 2 字数115千
1990年7月第一版 1990年7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 1,250

*

ISBN 7-5366-1296-6/F·60

定价：2.00元

《中国改革研究丛书》编委会名单

主 编 童大林

副主编 宋廷明 郑新立 李松晨 陈佳贵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孙祥剑 刘溶沧 刘福垣 吕 清 宋廷明

陈佳贵 李松晨 郑海航 郑新立 高铁生

童大林 董京泉

常务副主编 陈佳贵

让理论之树常青

(代 序)

童 大 林

有一句名言：生活之树常青，而理论是灰色的。这是针对那种理论脱离实际、理论发展落后于实践进展的状况而言的。我国近十年城乡改革的历程，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则是另一番绚丽多彩的图景：不仅实践繁花似锦、争奇斗艳；而且理论之光璀璨夺目，熠熠照人。无限丰富的改革实践为科学正确的改革理论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良好的气候条件，理论上的新思想、新观点破土而出，生机勃勃，联翩涌现。在这改革的年代，不仅实践之林根深叶茂，理论之树也四季常青。

伟大的社会变革必然产生出无愧于时代的先进理论。近十年来，在我们中国这个既古老而又年轻的国度里所进行的这场伟大变革，犹如大海的波涛，猛烈地冲破了旧体制的堤坝，摆脱了旧观念的束缚，荡涤了“左”的僵化思想的积习，使整个国家的面貌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给我国理论界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为我们党制定一系列马克思主义路线奠定了基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理论，为全党胜利实现工作重点转移、集中全力搞好改革和建设，确立了行动的准则；关于我国还处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为我们进行这场震惊世界的改革，提供了根本依据；关于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为在城乡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总的方向；关于国营经济必须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使企业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原则，为增强企业活力、广泛推行承包、租赁经营责任制，提供了依据；关于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观点，为搞活城乡经济，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天地；关于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的设想，为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繁荣社会主义经济，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关于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实行多种分配方式的理论，为实行正确的分配政策和建立新的社会保障制度，找到了正确的途径；关于广泛开展社会主义竞争的理论，为增强企业在国内外市场上的应变能力和使各种人才脱颖而出，提供了新的机会；关于充分发挥中心城市功能的方针，为发展各种横向经济联合和建立以中心城市为依托的各种经济区，找到了科学的依据；关于政府要由直接管理为主向间接控制为主过渡的设想，为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和政府机构的改革，指出了奋斗的目标；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实行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政策，为打破旧体制格局和建立开放型的新体制模式，提供了有力的论据；关于实行党政分开、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制的构想，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勾画出了宏伟的蓝图；关于经济发展必须依靠科学技术进步，科学技术必须与经济建设相结合，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的观点，为进行科技、教育等体制的改革，确立了指导方针；关于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观点，为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改革，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打下了思想基础；等等。所有这些新的理论、新的思想、新的观念，将构成指导我们今天这场伟大变革的改革理论体系和框架。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改革的理论体系，正是摆在我们广大理论工作者、实际工作者和千千万万改革者面前的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近十年来如此丰富的城乡改革实践，为我们全面系统地研究改革的理论，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矿石和原料。当前，迫切需要理论工作者按照党的十三大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探索，紧密结合中国改革的实际，对十年改革的实践经验，从理论上加以概括和总结，进行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精炼和加工，使认识发生飞跃，概念得到升华，由经验上升为理论，由思想的火花变成指路的灯塔，把零星的观点提炼成系统的理论，逐步形成一个完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理论体系。这无疑是一个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老的理论工作者和中青年理论工作者、专业理论工作者和业余理论工作者、社会科学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等各方面专家、学者的密切协作和共同努力。改革越深化，理论的指导作用越显得重要。应该说，脱离了改革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没有正确理论指导的改革实践是盲目的实践。现在需要我们更好地把理论与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不断把各项事业推向前进。

党的十三大向全国人民提出的中心任务是加快和深化全面改革。改革的实践造就了一大批改革人才。近年来，许多颇有建树的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在改革的实践中崭露头角，给理论界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他们在改革的大潮中搏浪前

进，采撷浪花，探索规律，提出了很多新的观点和见解，已经引起了理论界和国内外的普遍重视。这次，重庆出版社捷足先行，特地将这些同志的一批最新研究成果汇集在一起，准备陆续出版一套“中国改革研究丛书”。这套丛书的出版，对于加强改革的理论研究和舆论宣传，对于加快和深化政治、经济、科技、教育等体制的全面改革，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和促进。当然，任何理论都要经受历史和实践的检验。这套丛书中的许多理论观点，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发展和完善。但是，这毕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希望，这套丛书中的许多一家之言和一得之见，能够迎来改革理论研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局面。

一花引来万花开。又一个姹紫嫣红、百花争艳的春天到了。1988年，这是中国大地上第十个改革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欢迎她！愿灿烂的实践之花，在这大好的春天里结出丰硕的理论之果。

1988年春，于北京

目 录

一	投资及投资体制的“定位”分析	(1)
	(一) 投资——一个被长期忽视与遗忘了的重要“基因”	(1)
	(二) 投资的运作策划与经济有效增长的相互关系	(4)
	(三) 投资体制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要地位	(7)
二	投资主体的格局变动与重新塑造	(12)
	(一) 十年来投资主体格局在改革中的新变化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12)
	(二) 继续重塑投资主体格局的改革思路	(18)
三	投资规模管理体制与调控机制	(25)
	(一) 新时期投资规模膨胀的新特点及其成因	(25)
	(二) 投资规模膨胀的体制因素分析	(28)
	(三) 对社会投资总规模适度与否的理论和实践判断	(34)
	(四) 改革投资规模管理体制和调控机制的对策探讨	(39)
四	宏观投资结构的调整与改革	(48)

(一)	对我国投资结构现状的分析·····	(48)
(二)	完善投资结构管理和进行相关体制改革 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59)
(三)	三次产业及投资结构变动的国际比较和 相关思考·····	(64)
(四)	我国近中期投资结构调改的主攻方向和 宏观调节方式的选择·····	(73)
五	投资来源模式、投资方式选择及产权制度 改革·····	(81)
(一)	不同体制与国情条件下的投资来源模式 分析·····	(81)
(二)	投资分配、运用方式的选择与变革·····	(91)
(三)	股份投资与股份制产权组织关系的形成 和演进·····	(104)
六	投资决策体制的改革与完善·····	(113)
(一)	传统投资决策体制存在的严重弊端·····	(113)
(二)	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决策的一般 特点·····	(117)
(三)	改革完善我国投资决策体制的若干 设想·····	(126)
七	投资体制改革的综合配套要求·····	(133)
(一)	计划体制的配套改革问题·····	(133)
(二)	社会分配体制的配套改革问题·····	(136)
(三)	物资流通体制的配套改革问题·····	(146)
(四)	价格体制的配套改革问题·····	(149)
八	需要提出和解决的两个理论与实践问题·····	(153)

(一) 对投资膨胀与投资不足的矛盾分析.....	(153)
(二) 建设资金短缺和积累率高低、投资集中 分配程度之间的相互关系.....	(158)
后记.....	(166)

一 投资及投资体制的“定位”分析

投资体制改革是我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继续深化改革的一个重点内容。正如一切方方面面的体制改革，都要以其自身的特点和作用及其作用的环境和客观条件为依据一样，对我国新时期投资体制改革的研究，首先要对投资本身及其体制进行定性与定位分析，否则，就不可能取得预期的改革效果。

（一） 投资——一个被长期忽视与遗忘了的重要“基因”

从最本质的意义上说，一切经济问题，都可以归结为投入产出问题。而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投入又首先表现为价值形态的货币投入，即通常所说的投资。因为生产、流通所需的物质要素，必须通过预先垫支的货币去购买，劳动者的报酬也要用货币去支付。于是，不管与什么社会经济制度相联系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亦不论是对整个社会再生产，还是对个别的生产经营活动而言，一定数量、一定构成的资金投入及其运动，无疑都是其重要的先决条件，是商品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初始”性、“继发”性“基因”。这个道理十分简单，但却成了困惑我们长达数十年之久的复杂经济问题。

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忽视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性质和价值规律的作用。理想化的产品经济模式，对商品货币关系的若即若离、若明若暗的含混态度，使得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的投资问题，长期处在一种浑浑沌沌、说不清、道不明的状态之中。

表现之一是：有投资而无理论。

资本或资金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产物，或者说是与商品经济关系紧密相连的一个历史范畴。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在统计学的意义上，尽管我们并不抹煞和否定“投资”这个概念，但它却与自然经济、产品经济的思想指导和理论基础存在着根本冲突。因为，实物经济与商品货币经济之间是不可能具有共同的运作理论依据的。也许正是由于这个根本性的原因，在我国和苏联东欧国家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投资理论几乎是一片空白，一块待开垦的处女地。这种忽略与遗忘，并不是经济学家的疏忽，而是在产品经济的理论模式“地基”上，根本不可能建立起与商品经济相联系的投资理论大厦来，致使这个作为商品经济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基因”，在理论上显得十分苍白和冷落。

表现之二是：有投资行为和投资活动，但没有相对独立的体制可言。

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高度集中的、以行政手段为主的计划指令，统收统支的财政分配、利益分配格局、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同一性，投资渠道与投资主体的单一等，使得投资体制的研究显得既无必要，又无实质性的意义。只

要投资跟着计划“盘子”走，资金跟着实物走，企业跟着行政指令走就行了。经济运行的指令化，投资方式和投资目标的实物化，不仅使投资体制湮没在计划、财政等体制之中，丧失了自身的存在价值和相对独立性，而且使这个商品经济中的活跃“基因”变成了被牵着鼻子走的驯顺“羔羊”。

表现之三是：有投资而无投资机制。

在现代商品经济条件下，与利益关系、价值增殖预期、社会和经济效益紧密相关的资金投入、运行和转移，本来是一种至关重要、带有强大“推力”的市场经济动态影响因素，一种灵敏的经济机制。但在旧的经济体制和投资模式下，资金投入的行政指令性，资金使用的无偿性和责权利的严重分离，资金(资产)转移流动上的困难与障碍等，却使投资方面的种种有效机制丧失殆尽，仅仅成了实现和服从于实物经济数量增长需要的一种手段或具有价值表象特征的工具。

总之，在我国的经济建设实践中，投资是一个长期被忽视、被遗忘和被扭曲了的问题，也是产品经济模式下的必然现象。只有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在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和充分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这个科学命题以后，随着城乡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广泛发展，旧的计划、财政分配体制和投资模式的被打破，以及社会投资来源多渠道化、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决策多级化格局的出现，资金市场的逐步建立和发展，新时期的投资理论和体制改革问题才被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从一定意义或一个侧面来说，这也是一种历史的觉醒，一种新形势下发展与改革实践的强烈呼唤。

(二) 投资的运作策划与经济有效 增长的相互关系

投资既然是商品经济的重要启动力量 and 发展的必要前提条件,因而也就必然会对国民经济的有效增长,即对宏观经济上具有较好的投入产出比较效果的国民经济增长,产生内在的巨大影响,从而成为投资体制改革必须考虑的重要目标。

首先,社会总投资的持续均衡增长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之间,有着极为紧密的、带规律性的内在联系。

表1 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与国内投资年均增长的对比

国 别 (地区)	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国内投资总额年均增长(%)	
	1965~1973年	1973~1984年	1965~1973年	1973~1984年
美 国	3.2	2.3	2.7	1.5
联邦德国	4.6	2.0	4.4	1.3
日 本	9.8	4.3	14.1	3.0
法 国	5.5	2.3	6.9	0.4
英 国	2.8	1.0	3.1	-1.0
意 大 利	5.2	2.1	5.9	-0.5
巴 西	9.8	4.4	11.3	—
马来西亚	6.7	7.3	9.1	11.4
南 朝 鲜	10.0	7.2	19.7	8.8
香 港	7.9	9.1	3.7	9.7
新 加 坡	13.0	8.2	22.7	9.5

[资料来源: 参见世界银行1986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6年版,第183、187页]

从国外（境外）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表1的资料说明，在1965~1984年长达20年的历史时期中，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与国内投资总额的年均增长速度之间，出现了一种大体同步的趋势，这种趋势越到后来，即到了1973~1984年这一时期，就比前一时期表现得更为明显。如果说前一时期还在日本、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四个经济发达国家中存在着投资增长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情况，那么，在后一个时期这种情况就普遍消失了，出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都一律高于国内投资总额年均增长率的形势，在英国和意大利还出现了投资负增长而经济却正增长的情况。与此同时，在发展中国家中也开始出现了投资与经济增长率逐步接近、大体同步的势头，特别是在表内后一个时期中，新加坡和香港地区的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也超过了投资总额的年均增长率。这些情况说明了什么呢？第一，说明了投资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所存在的紧密内在联系；第二，说明了二者双向增长的一种带规律性的历史发展趋势，即双向均衡、大体同步的关联性变动态势。这一点，对于当今世界各国政府都普遍把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视为经济政策要义和最佳的发展模式选择来说，无疑具有特别重要的借鉴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我国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尤其是国民经济发展所遭受的几次重大挫折的历史教训也充分证明，凡此类挫折的酿成，都毫无例外地首先是从投资的重大决策失误，基本建设规模的急速膨胀引起的。而在每一次事后被迫进行的经济调整时，亦毫无例外地又首先是从压缩投资规模、调整投资结构、逐步恢复被严重破坏了的投资均衡增长入手的。可以

说，我国30余年经济发展上所出现的历次大波动，实质上就是投资上的非均衡增长大摇摆。大上大下、大起大落的投资“疟疾病”，必然使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变为戏言。

其次，社会投资结构的协调平衡，对于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产业结构的优化组合和各类资金之间的配套衔接运动，从而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具有重大的、先决性的影响。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市场的供求关系瞬息万变，国民经济结构及其发展态势也始终是一个复杂的、多组合型的动态系统。要不断保持宏观经济发展所要求的相对平衡性和比例性，就必须充分发挥市场的自组织功能和价格机制的作用，依靠国家产业政策的指导和多种宏观调控手段的运用。但是，不论保持和促进国民经济结构平衡与比例协调的方式怎样，手段如何运用，往往是与新增投资的结构变动，资金存量的结构调整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大至国民经济结构，小至企业产品结构的变化，都将以市场为枢纽，直接或间接地通过资金流向流量的相应变化来实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投资增量的结构安排、投资存量的结构调整，对于合理的宏观经济结构、社会产业结构的形成、变动，从而对于按比例发展基础上的国民经济有效增长，具有先导性的影响与意义。理论和实践都充分表明，对国民经济的结构导向，总是首先从投资导向开始的；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和重新组合，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投资结构的调整与重组。

第三，社会投资效益的高低，对宏观经济效益的增进，

对实现我国从传统的“数量增长型”到“效益中心型”的经济发展战略转轨，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不断提高社会经济效益，这是当前我国改革与发展的最大目标和中心，也是衡量经济改革、经济发展成功与否、得失如何的重要标志。所谓社会经济效益，不外乎就是从全社会来看投入-产出的比较。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投入本身就其价值表现或价值形态来说，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投资。因此，在产品经济条件下天然地存在一种单纯追求实物增长的偏好，以及只重数量增长而不讲投入效果的弊端，那么，商品经济环境中的情况就会与之完全相反。等价交换、等量补偿的商品经济原则，投入与产出天然联系在一起的价值决定原则，必然促使商品生产经营者高度重视所费（投资）与所得（利润）的比较，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必须建立在产出大于投入，即不断提高宏观经济效益的基点之上。否则，不仅经济的发展将会因“产”不抵“投”、得失相当或效益增长的停滞、萎缩而无从谈起，而且旨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改革也会变得毫无价值。正是基于投资效益与生产经营效益、宏观经济效益在很大程度上的这种同一性、“互感”性，因而与我国新时期经济发展战略的根本转轨有着如此密切的内在关联，所以，我国当前和今后的一个时期里，投资方面种种问题的解决和投资体制的逐步改革，就显得十分重要、格外令人关注。

（三） 投资体制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要地位

正如投资现象和投资关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无处不在一